

王

朝

柱

精

选

文

集

作  
者  
出  
版  
社

# 周恩来在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在上海/王朝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1

(王朝柱精选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6099 - 9

I .①周…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1658 号

## 周恩来在上海

---

作 者: 王朝柱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63 千

印 张: 29.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99 - 9

定 价: 3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 作者简介

---

王朝柱，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史传类作品《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周恩来在上海》、《爱的旋律》、《女囚徒》、《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功臣与罪人》、《谍海奸雄》等，参与创作话剧剧本《决战淮海》，以及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邓小平》、《长征》、《张学良》、《延安颂》、《解放》、《辛亥革命》及电影剧本《龙云和蒋介石》等。《决战淮海》获全国优秀剧本奖，《李大钊》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东方杯奖，电影《长征》获华表奖和百花奖，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周恩来在上海》、《长征》、《延安颂》、《张学良》等获飞天奖、金鹰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六次获最佳编剧奖。

# 序

李硕儒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 23 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乃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 72 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

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也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不小，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流向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蒙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接续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问。他倒并不反感，说他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他打成“反

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又已准备让他做院长赵沨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最终达到了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剧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街谈巷议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皇皇73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那时，“非毛”的声音不绝如缕，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也屡见不鲜，他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不能不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他又一次使我震惊了。不同于任何这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以个人经历个人所知的某战役某人物的回忆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大势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

图谋与残酷、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高层的纵横谋略及至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长征中，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也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观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我预感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完全会廓清不少是非非的传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保持毛泽东形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会有不菲的贡献。

果然，《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出版后，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与他切磋；当时主管影视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给他命题；军界领导周克玉和军内著名作家徐怀中对其创作关怀备至；那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广电部部长田聪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爱听他讲国共大事的来龙去脉，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长的身份关爱鼓励无以复加。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假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葱葱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忘却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逢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戏就是朝柱

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所以能如此，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着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其作品当更会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还有其他朋友对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称他为大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当听到作家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王朝柱选集》时，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众多编辑们的眼力、胸襟和作为。朝柱选集的出版，定会是于史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族文化积累有益的一件大事。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说说我对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体悟，实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

## 前　言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党性原则、外交策略、人格魅力……深受中外人士所赞扬。随着时代的推移，周恩来作为东方道德的代表，不仅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传扬。全面正确地反映周恩来伟大的一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笔者多年追求的创作愿望。

《周恩来在上海》是作者创作的史传文学《周恩来》之第二部，它集中地描写了周恩来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在这期间，周恩来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尽心竭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他在对敌斗争、党内路线斗争、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收集情报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等方面，都以惊人的智慧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并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周恩来的这段经历鲜为人知。拙作《周恩来在上海》，就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周恩来在上海这四年又一个月的革命活动。

由于《周恩来在上海》是一部史传文学，因此它应具备史、传和文学三个方面的属性。所谓史，就是要求作者采用唯物史观较为正确地反映这段复杂的历史。再者，正因这段历史十分复杂，且又有着很多敏感点，这就必然要求作者在忠实于历史的同时，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有所取舍。所谓传，就是说这部《周恩来在上海》是为周恩来作传的。因此，这部书的主线是围绕着周恩来展开的。自然，书中所选取的有关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为周恩来服务的。所谓文学，就是明

确界定《周恩来在上海》是一部文学化的历史人物传记，非正传或评传等。这就要求这部作品除去上面说的史传的属性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因此，对历史环境的描写、对传主周恩来的心路历程的阐演，以及事件的组织和大部分对话都是文学化了的。简之，笔者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

一、忠实于历史。唯有忠实于历史才有生命力，塑造的周恩来艺术形象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为增加这部史传文学的可信性，大凡能援引史料的地方绝不行文杜撰。

二、艺术地再现周恩来。一句话：波澜壮阔的历史、浩瀚无尽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周恩来这个伟大的艺术形象服务的；所有的艺术创造手段，也只是塑造周恩来这个伟大艺术形象的工具。唯有如此，才会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

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都要随时改名换姓，因此有着很多的名字。但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那个时代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丰功伟业，笔者基本上不用代号和时名，均用党中央所通用的名字。

需要说及的是：这部《周恩来在上海》写成草稿之后，已经谢世的电影大家丁桥同志希望我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借以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后在李琦、金冲及、罗青长、何敬修、黄允升以及安全部许多同志的关心下，终于完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并由中央电视台投资拍摄。因此，这部《周恩来在上海》的完成稿，很自然地吸收了电视连续剧的内容。

在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笔者参阅并恭录了大量的史料，甚至还选录了一些本属于其他学者的科研成果。有些主要著作附记书后，有些在引用时注明出处，有些就化入行文中。对此，作者是深表感谢的。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唯望贤者指教。

二〇〇八年二月于北京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篇 / 1

第二篇 / 116

第三篇 / 264

主要参考资料 / 452

# 第一篇

##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连昼夜忙碌的客货两用码头九龙深水埗，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着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个“共匪”漏网。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轮停靠在码头旁边，持枪的港警如临大敌，操着粤语骂骂咧咧，查看着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白忙了一阵，没有抓到一个可以领赏钱的“共匪”分子。自然，他们一个个也就没有了情绪。就在这时，从客轮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香港币，塞到一个港警小头目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们喝早茶吧！”

这些港警见钱眼开，一个个点头哈腰。那个收钱的小头目有意摆了摆手中的港币，说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溃败的‘共匪’出入香港。”

这位大副十分通情达理且又不失身份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一辆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打开轿车后门，恭立门旁，伸出右手挡在轿车后门的上面，生怕主人碰着头。少顷，一位身着旗袍、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士侧身钻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双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飘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银的红木手杖，很自然地说明了他的身份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绅士。

随着一声“伍先生，请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经赶到近前，躬身一

边，伸手指着检票登船的地方。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位女士的搀扶下缓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回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等奉命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恰在这时又身染恶性疟疾，发着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他身边的叶挺、聂荣臻，以及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由陆丰甲子港登上一条小船出海，向着香港驶去。这条小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诚如聂荣臻所忆：“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

省委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是杨石魂背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走进租住的小楼的，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为了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省委又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由她出面请医生诊治。三天过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他一见床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叫范桂霞，是党派我来护理你的。”

“派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沈宝同。”

周恩来认识沈宝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人员，便放心地点了点头。在他养病期间，不仅知道了范桂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而且还从范处获悉邓颖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当他知道范桂霞的男朋友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潘耀芳后，又风趣地问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爱他？他是不是很爱你？”

范桂霞一听见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脸也红了，当她想到心爱的潘耀芳还在普宁训练农民军的时候，低下头小声地答道：

“我觉得是的。只是，现在革命形势紧张……”

周恩来一看范桂霞害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是，当他想到范桂霞欲言难吐的隐情时，便十分郑重地说：

“你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总会见面的。祝你们相爱终生！”

周恩来在范桂霞细心的护理下，历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范桂霞的搀扶下走到户外，进行恢复体力的练习。

十月十三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来到香港。接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此，周恩来又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参加会议。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并通过省委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与此同时，讨论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各地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会后，南方局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接着，周恩来又带病参加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久，张太雷经汕头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并参加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后，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除对广州暴动提出意见外，还特别写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必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来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不顾身体虚弱，化装成富贾绅士，在杨石魂、范桂霞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九龙深水埗，又在这位“大副”的帮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轮。分别前，他紧紧握住杨石魂、范桂霞的

手，低声地说：

“要有信心，胜利总归是我们的。我们在胜利后再相见！”

客轮缓缓驶离九龙深水埗码头，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乘风破浪，向着上海驶去。

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它不仅是东西方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种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自然，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来，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同时也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这里处处都是腥风血雨，时时都在响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声。进入十月之后，为了谨防南昌起义失散的共产党人潜回上海，黄埔港码头又成了国民党军警宪特肆虐扬威的地方。他们就像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狼，每人手里拿着一沓放大的相片，对着走下客轮的旅客认真地查看，希望能发现周恩来、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

但是，化装成富贾绅士的周恩来在那位大副的陪同下，就在这群恶狼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检票口，走到了热闹非凡的广场。顷刻之间，接送客人的、拉黄包车的、做小买卖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几个报童的叫卖声格外响亮：“看报！看报！蒋总司令下野去日本，终于追上了宋家小妹宋美龄，声称近日回上海结婚！”正当周恩来欲要取钱买报之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嘎的一声停在他的身旁。他循声一看，轿车前门打开了，走下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摇着手中的报纸，非常客气地说道：

“伍先生，请上车吧！”

周恩来告别了那位“大副”，俯身钻进轿车的后门，顺势往靠背上一躺。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是那样的疲惫不堪，遂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希望早一点儿到达下榻处，见到久别的战友和伴侣邓颖超……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不久，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母亲杨振德于七月底结伴回到了上海。那时，党中央依然留在武汉。她回上海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她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她心里明白，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必须首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为此，她十分理智地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

保密制度，不该知道的就不问。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向她告别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马上去江西九江”。至于去九江干什么，待多久，他一句也没说。邓颖超也像往日分别那样，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作为深爱着周恩来的战友和妻子她比谁都清楚，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次生离就意味着有死别的可能！所以，每到夜深人静尤其是猝然听到敌人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或警车嘶鸣的时候，她就下意识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刻，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恩来的安危……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不久，她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时，她真是高兴极了！但是，不久她又从敌人的报纸上相继获悉：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并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堵之下，转战南下广东。当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起义部队兵败潮汕，敌人胡说什么“共匪重要首领周恩来、叶挺仓皇逃窜，不日即将缉拿归案”的时候，她不仅为南昌起义失败而痛心，而且也为周恩来的命运担心。她数度在梦中见到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可大梦醒来之后，那惊喜之情又化作了忡忡的忧心……

邓颖超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愫中，不露声色地为党工作了三个多月。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些年来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养成了无比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钟爱女儿邓颖超、女婿周恩来的方式——在默默地为革命工作中分担他们的喜和忧。今天中午，女儿邓颖超没有回来吃午饭，她一个人对着两个人的饭菜，还是像往日那样没有一点儿胃口，随便地吃了一些，就靠在沙发上想闭目休息一会儿。少顷，户外突然传来警车的叫声，她下意识地睁大双眼，听了听这由远而近的嘶鸣，又慌忙站起，快步走到窗前，惶恐不安地向窗外探望，直到警车的叫声远去之后，她那颗提着的心才感到踏实一些。当她再回到沙发前坐下之后，一点儿困意都没有了。这时，她为了打发午休的时间，自然也想从敌人的报纸上找到有关周恩来的消息，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摞当天的报纸。当她双手展开一份报纸之后，被通栏大字标题怔住了。只见上面写着：“北方共匪巨首王荷波落入法网，南方共匪党魁周恩来末日来临”。她捧读报纸的双手颤抖了，她那刚刚平静的心又加速了跳动，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急切地看起这条消